



沁州俊才李树仁

王效堂

最近,我在太原小住。一天早上到公园散步,看到《太原日报》《太原晚报》的报栏前,总是吸引着一群读者,他们边走边说,《太原日报》《太原晚报》办的有特色,可读性很强……还听说《太原日报》是个沁县人当家。这时,我突然想起,《太原日报》正是我县乡亲、原省委书记王大同同志办起来的。时隔几十年了,今天沁县人又担起这个重任,心中十分快慰。

10月14日上午9时,天上着零星小雨,我打着雨伞向太原日报社走去。走不多远,29层的报社办公大楼就屹立我的眼前,走进楼内一打听,才知社长姓李,住在二十一层办公。

我冒昧的敲开社长办公室的门,接待我的正是李社长,他五十来岁,十分精干。我们未谋过面,想不到他竟将我一眼认出,叫出我的名字。原来是看过我写的《沁州散记》,见过书中的照片,我很感动。这时他放下手头的工作,让请示工作的同志稍等一会。趁机,我看看他的办公室,小得可怜,仅有十来平方米,二十多层楼,几百个房间,难道还没有社长的大一些的办公室?可见,李社长身上仍保留着沁县人老实本分的秉性。

经交谈,才知他是册村镇马服村人,不仅和我是同县,而且同一乡镇。所以说很随和,越谈越热乎,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他很关心家乡,也关注沁县经济发展。他说,看了我写的《沁州散》记载的人和事,感到特别亲切。准备从《沁州散记》选择一些文章,登在《太原晚报》上,让更多人知道家乡的事。他说,沁县有许多历史文化需要发掘,许多历史典故需大写而特写。比如,清官吴琬,抗战中有许多英雄事迹非常值得可歌可泣,这样又利于招商引资。还和我谈到,武乡善于挖掘红色文化,人家几句话把武乡介绍得活灵活现,如武乡是“山埋忠骨岭岭是丰碑”“武乡是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武乡是没有围墙的八路军纪念馆”,我们沁县各方面资源不比武乡少,大有文章可作……我俩正谈的兴致上,李社长的手机又响了,原来是市委通知他去开会,我一听,马上和他告别了,他说,给我泡得茶还没喝一口呢。

我走时,他要送到我电梯门口,我不让,因从办公室到电梯还有一段路。他时间紧,又要开会去,可他非去不可,临进电梯时,突然一伸手把住电梯门,告诉我他的手机号,说多联系。

电梯门关上了,关不住乡亲的心。我回来后,马上给他发了个信息:沁州才子李树仁,三晋报界建奇功。见面会谈家乡事,句句字字是乡情。

妈妈是名环卫工

史少娟

“环卫工”这三个字眼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就是卑微的代名词,这一职业,似乎没有一丝“高大上”的感觉。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人,她就是我的妈妈——一位再普通不过的环卫工。

我小学毕业后,因身体软弱,自理能力差,爸爸妈妈为我选择了可以走读的实验中学读书,并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给我做饭,方便我上学。进城居住生活,日常开支和生活消费自然增加了许多。仅凭耕种几亩薄田维持生计的家庭经济显得有些紧张。为增加点收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妈妈到一家小区做了一名清洁工。其实,说老实话,我是极不愿意让妈妈干环卫工的。因为,环卫工又脏又累又没地位……

每天清晨五点多钟,当许多人还在熟睡时,妈妈和许多在街上打扫卫生的环卫工叔叔阿姨们一样,已经起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沙沙沙的扫帚声沉重而悠扬,划破了城市的宁静。一个星期的上午,妈妈正在打扫时,我鬼鬼祟祟走了过去,看了看周围没人,才说道:“妈,给我五元钱,我要买笔和本子”。妈妈掀起宽大的环卫服,摸摸索索掏出五元钱递给了我,我又看了看没人,接过钱后,示意妈妈把帽子按到最低下才放心离开。

一会儿,我还没走多远,便看见一位打扮时尚的年轻妇女领着孩子在距离垃圾桶仅有一步之遥的地方把垃圾扔在了妈妈身边。只听那孩子说:人家阿姨刚打扫干净,你就乱扔垃圾,老师说这是不礼貌的行为。那位母亲说,她挣的就是这钱。我听了不由怒火冲心,可转念一想,自己刚才和妈妈要钱时的举动又何尝不也是看不起妈妈吗?我看见妈妈没有吭声,而是慢慢走过去,弯腰把食品袋捡起放到了垃圾箱里。这时,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泪水情不自禁地在眼眶打转……我想,妈妈的内心深处肯定也很难受,但她默默地忍着,因为她知道,刚干这份工作,一位“老环卫”就对她说过:环卫工作很辛苦,一些人对此职业有偏见,被人讥讽谩骂是常有的事。何况,妈妈心里更清楚:钱难挣啊!此时此刻,我看见那件宽大的环卫服穿在瘦弱的妈妈的身上,是那么的协调;我真想大喊一声:我的妈妈是一名环卫工,是让我骄傲的城市美容师。

环卫工用扫帚作笔,大地作纸描绘着城市的美丽。他们也是最美的。在此,我向妈妈致敬,向所有默默无闻的环卫工致敬!

(注:本文参加山西工人报“迎泽环卫杯”微叙事征文活动入围第一轮评选。)

忆父亲

王翠青

父亲离开我已十年有余,但十几年来四年魂牵梦绕,从未间断。很早之前我便想写点纪念他的文字,但总担心自己拙劣的文笔不能真切的表述父亲,所以至今未能落笔。

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有小学文化,双眼皮,大眼睛,标准的国字脸。准确地说父亲一表人才,挺帅的。尽管那时候家里很穷,没有件像样的衣服穿,照样埋没不了他的人才。小时候的我经常坐在父亲的膝盖上缠着父亲给我讲故事、读小人书,做游戏,在地里劳作了一天的父亲从来不说累,也不嫌我烦,总是乐呵呵地哄我玩。为此招引来不少小伙伴们对我的羡慕和嫉妒,都说父亲太宠我、爱我、惯我、亲我。就这样,我在父亲的怀抱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至今想起来都是暖暖的幸福回忆,父亲留给我的这份深情,使我终生难忘。

父亲一生的工作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田地就是他的乐园,他的希望,他在这块黄土地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耕作,撒下汗水、收获希望。每年我家总是粮仓满囤,全家人在父亲的辛苦劳作下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左邻右舍都夸父亲勤谨、能干。记得有一次我心疼父亲受罪,说,您就不用每天去地里干活,天天去就能绣出个花来?父亲说庄稼人不去地里看看不踏实,去地里锄锄草、看看庄稼的长势心里高兴。现如今我长大了,也为人父母了,才体会到他当时的那份责任和担子。民以食为天,父亲,您把自己强健的身体、朴实的精神都献给了大地,为我们这个小家,还有国家付出了一生。

2004年的5月1日,母亲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来不及和我们说一句话告别的话,就匆匆离开了人世,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伤痛和思念,哭天喊地也唤不回我

的母亲。当我们还沉浸在失去母亲的悲痛中时,又一个噩耗传来,我带父亲去医院做检查的结果是胃癌,知道这个噩耗的时候,我感觉天都塌了,情绪失控,眼泪像奔腾的海水不听话的一泄而下。老实善良的父亲那时一脸茫然,他还不知道可恶的病魔正向它袭来。我怕父亲从我的脸上看出什么,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作出笑脸,告他没事,小毛病而已。对不起,父亲!关于父亲的病情我们姊妹们商量后还是决定隐瞒下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失去母亲的同时,父亲也失去了他终身的伴侣,他比我们做儿女的更伤痛,我们不能再在他伤口上撒盐了。随后我婉转的说想给父亲做手术,他坚决地拒绝了,他说他不愿意在自己身上动刀了。我们想来想去还是遭父亲的意愿保守治疗。父亲,在那段时间里我每星期回去看您、陪您,看着您日渐消瘦的脸庞,我的心好痛、好怕呀!我怕失去您、怕您离开我,我怕再也看不到您,我怕再也摸不到您的手、我怕以后发生的事情……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一刻还是来了,两天两夜疼痛的折磨,耗尽了您对抗病魔的所有力量,永远地闭上了您那双我害怕再也看不到的眼睛,追随母亲去了。

父亲,您一辈子以土地为生,视土地为命,身后回归您终生热爱的土地,您和母亲在地下安息吧!您的儿女永远想念你们。



我的叔父王维恒

王振中

叔父离开我们已经近三十年了,但对他的怀念从未间断。很想写些纪念他的文字,但总因拙笔难就。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再次激起我对他的怀念。

叔父王维恒,1910年10月1日出生在沁县牛寺村,抗战爆发,叔父和村里二三十个青年凭着一腔热血投身抗日。叔父在战斗中英勇杀敌,表现突出,1938年8月被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叔父的信念更加坚定,组织上也对他十分信任,先后担任过沁县公安局游击队队长、连长,漳源县公安局公安队长,新绛县、高平县公安局副局长,太岳区第四分局科长,济源县公安局局长、县委委员等职。从小时候听村里的老人说,叔父在太岳区、济源县打得鬼子魂飞魄散,闻风丧胆。

叔父担任沁县公安队长时,有一次得知鬼子到村里杀害抗日游击队员,他马上带领队伍,把老弱妇孺送到山里隐蔽,带队员在村里挖了很多陷阱,埋上地雷,声东击西将鬼子队伍引到包围圈各个击灭,日本鬼子气急败坏,悬赏十多万大洋通缉他。日本鬼子抓不到叔父,就对叔父家人进行迫害。我的三叔(叔父的弟弟)去南里出家做了和尚,日寇让他说服哥哥投降,三叔誓死不答应,日本鬼子用刺刀将他捅死。我的父亲(叔父的哥哥)带着一家人到檀山逃难,也多次被日寇抓捕。自从叔父参加抗日斗争开始,家里就没有平静过,敌人三天两头来搜查。为了支持叔父抗日,我婶婶一个人带着儿女到了长子县大山里的一个小村庄田家沟,又要种地又要带孩子,还要随时躲避日寇的袭击,直到胜利后才回到老家。1943年,我爷爷去世,叔父的驻地离家只有二三里,但始终无法回家为父亲送终。日本鬼子的罪行更加激起了叔父对日寇的仇恨和抗日的决心,他英勇杀敌、奋不顾身。

1947年初,响应中央号召,老区干部南下接管新区,叔父告别了妻子儿女,

沁州黄送给八路军

史琦玉



百团大战后的一天,新店镇史家庄武委会(民兵游击队)接到给驻扎在辽县的八路军总部送军粮的任务。只有二十四五户人的小山村便开始忙乎起来。白天怕鬼子发现,全村老幼晚上备上牲口碾米,过了三天后,各家米都已碾好。然而,这两天有两户人家的男人有病,一户是男人得了疥疮,还有一户是男人发疖子(也叫打摆子),不能行动。民兵队长史水生要求体壮力大的民兵史俊明、史留孩、刘彦成等人给他们分担一些,然而这两家女主人坚持不让,她们和男人们一样,要亲自到辽县送粮。

从史家庄到辽县,小百里山路,远路没轻担,一个人最多担挑六七十斤。这天,天一黑,送粮队伍便悄悄出发了。出了村,走任庄、赵庄、史北,顺着山梁向石家岭方向行进。这时,天上开始纷纷扬扬下起了小雪,路更滑了。刺骨的寒风

夹着雪花打在脸上,,他们跳着重担,顶着风雪继续前进,路过村庄还不时有野狗袭扰,民兵们用枣木棍子和石头把狗撵走,又继续赶路。

进入襄武交界处,,忽然听到公路上有汽车的轰鸣声,民兵队长史水生赶快叫大家放下担子,躲在沟旁的草丛里,把米担藏好,他领着民兵到公路边侦查动静。原来是小鬼子的一辆汽车从襄垣过武乡,敌人向两旁的山上打了几枪,汽车开过去了。他们赶快叫送粮队过了襄武公路,走了一段大路,突然听到有脚步声,等他们走近才知道是为老娘疾病而请医生的兄弟俩。他们过后。送粮队才从荆棘中钻出来又匆匆赶路,进入了武乡县临漳后,由于坡更陡路更滑,路两边满是带勾刺的酸枣树,青年妇女李二孩不小心一脚踩空滑到坡下,不能行动。村人们赶紧点亮马灯,找到粮袋,缝好口袋。派出两个民兵把她送到附近一个小山村,敲开一户人家的门,在老乡家养伤,送粮队继续向辽县前进。

经过一夜跋涉,送粮队终于到了辽县,把近10石沁州黄小米送到了总部。首长说:“连夜跑了上百里山路,老乡们你们辛苦了。”奖给村民兵游击队十二颗手榴弹,大伙出过饭,高高兴兴往家返。途中到老乡家接李二孩时,才知道她孩子流产了。民兵们制作了简易担架,抬着她回到了史家庄。

完成了这次送粮任务,史家庄群众拥军抗日的士气大振,史俊明、刘彦成、史留孩等骨干被吸收到四区太行抗日游击队(后扩大为太行独立营),继续战斗在太行山上。



漳水源头

文艺副刊

一根扁担

郭怀应

我家有一根家传的扁担,现在却象闲杂物件一样,在一个屋的角落里闲置着。

说起这根扁担少说也有百年的历史了。那是我父亲二十多岁时在南泉小楼沟租地时置办的,它原是一根丈二长的榆木椽子经木匠修理,修理成一根既长又粗且扎实雄厚,两头弯弯翘翘的榆木扁担。父亲那时年轻体壮,身材魁伟。劳动时,父亲运用这根扁担,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父亲用它从山上担柴,十多里山路不换手,轻轻松松就担回了家,他的同龄人试着担这两捆柴,竟起不了架,不要说担一担,就是一捆柴,他们也挪不动。

父亲担起柴,轻迈脚步,随着一呼一吸的配合,柴捆在扁担两头,一上一下,轻轻颤动,显得既快捷又省力。

这根扁担,随着父亲年龄的增长,进行过两次修理。在他40多岁时,修过一次,两头截去一节,周身削的薄了点。第二次修理时,在他50多岁,这次两头又截去一节,周身又削薄了一点。经过两次修整,扁担短了许多,薄了不少,但和其他人用得扁担相比,它仍然显得又长又雄厚结实。

这根扁担至诞生以来,随着父亲走过的历程,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年轻时父亲打短工,当长工,用它担庄稼、担柴火,担粪。中年时,解放战争时期,它随父亲前送过军粮,担过枪支弹药。新中国成立以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劳动生产中,担禾送粪,发挥了它最大的优势。一年中,从种到收,扁担和人影不离。

后来,父亲老了,扁担也闲了下来。我从学校回来,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也用过这根扁担。后来我走出村,走进社会,当了一名人民教师,扁担放置一边,竟无人问津了。

改革开放,农业实现机械化,三轮车、四轮车普及,儿孙们以后见到这根扁担,竟不知它是何物,它有什么用途。每逢这种情况,一种酸楚、苍凉的感觉便充满心灵。

其实,随着社会的进展,农业生产的现代化,闲置的何止是一根扁担,就是以前一切旧式耕作的农具,犁、耩、耙等不都也闲置一旁了。

这根扁担和一切旧式耕作农具的闲置,在农业实现机械化的进程中,农民表现出一种无奈,留之无用,弃之可惜。这是在新时代面前,农民的一种心态,既欢迎新时代的到来,又对过去艰苦岁月的恋恋不舍。他们毕竟是从那种艰苦岁月中跋涉过来的。对那种岁月还保留着一种深情厚谊。

这根扁担和一切旧式耕作农具,虽然失去了它们存在的意义,但现在已经超越了它们本身的意义,而成为社会发展中一个阶段的社会劳动生产的证据,它证明了当时那个阶段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力。

它还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怀念和保护。

这根父亲留下来的扁担,却成了一种历史,一种精神。



那年那月